



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保卫中国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美术作品)

朝鲜战争期间 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上)

文/沈志华

作为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选择研究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大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不置可否。

1950 年 1 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 4 月 10-25 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 3 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

支持。金日成认为,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并非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虽然,毛曾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 月 13 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15 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解放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

援。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毛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会谈刚刚结束时,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

6 月 25 日,战争突然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为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 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

军区部队中的 200 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 3 个军 12 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 9 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

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國內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 6 月 30 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时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或许是出于主权的考虑,朝鲜对中国使馆并未提供及时的信息。据柴成文回忆,当他 7 月 10 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未予答复。在同其他朝方人员

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 13 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

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 8-9 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方面未予重视。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到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

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

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没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

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防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

联及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金日成才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力争自力更生,取得战争胜利,而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各种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朝鲜对局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



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毛泽东本人也曾犹豫过。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人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是,在敌情紧迫

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有另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对此作了反映。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在彭德怀看来,似乎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

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关于对待俘虏问题,彭德怀婉转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参战。

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毛泽东在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



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

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

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

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如果与地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要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15日,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

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更胜一筹。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 26 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退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

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



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 年 1 月 3 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 3000 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

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 8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还是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

略。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的决定。9 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

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0 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 3 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日成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 9 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待续)

(《大道低理》)